

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进路

王树涛¹, 刘燕丽²

(1.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致力于实现的目标。教育的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使其在推进共同富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教育既是共同富裕的蕴含要素,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通过高质量教育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通过优质均衡教育缩小不同群体间的贫富差距,通过打造文化精品提升国民整体精神富裕程度,教育有助于促进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共同富裕。但当前我国教育领域的人才培养仍然存在短板,教育不均衡发展问题仍然严峻,教育对人民精神富裕度的提升仍显不足,需要在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强化公平正义格局、加强文化精品供给等方面进行破局。

[关键词] 高质量教育;教育均衡;共同富裕;机制机理

[中图分类号] G 40-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2024)06-0030-11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历代党中央领导人不懈追求与探索的目标^[1]。在新的历史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并重申了“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035年远景目标^[2]。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对于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与共同富裕具有天然的连接性,二者之间具有双向强化作用,教育能够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达成。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教育是共同富裕的蕴含要素。如果将共同富裕看作一个系统,其内在地包含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要素,共同富裕是这些民生服务高水平发展基础上的均等化。作为共同富裕要素之一的教育,通过高质量均衡发展,实现优质教育的全民共享,可达成教育上的“共同富裕”,直接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达成。二是教育是实

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共同富裕需要以“发展”与“共享”为关键切入点。其中,高质量发展需要以人才为支撑、创新为动力,而人才培养和创新生成都需要以教育为路径;共享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民、全面、共建和渐进的共享,其共建共享的属性,也决定了教育培育优质人力资本的必要性。教育通过细化培养目标与发展目标,经由贯穿全生命周期的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促进人才数量的扩张与人才质量的提升进而推进共同富裕。作为重要路径的教育,依靠自身内生发展动力,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质量,间接起到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

共同富裕是物质与精神的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提升,是社会整体精神风貌的改善,是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扩大,是社会分配结构从“葫芦形”向“橄榄形”的转变,而这些都有赖于教育要素或路径作用的发挥。基于此,本文对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现实障碍与实践进路进行审视,以期服务于共同富裕实践。

一、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

(一) 高质量教育: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认为,我们之所以关注正义问题是因为

[收稿日期] 2024-09-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新发展阶段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研究”(VFA220003)

[作者简介] 王树涛(1983—),男,山东青岛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及教育政策与管理。

我们恰好处于物资匮乏这一正义的要件之下,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认为解决社会正义问题的前提是“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只有在生产力提升起来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是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前提。作为高质量均衡的共同富裕,拓展富裕的广度以深化“共同”的形式,提升全体人民高水平获得感的关键是生产力的发展,达成共同富裕首先有赖于物质财富的积累。

共同富裕需要以高质量的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托,而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耦合协调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人力资本水平是扩充一国财富积累的关键。原因在于物质资本往往是有限的、消耗性的、不可再生的,而投资于人身上的资本则是增长性的。随着时间的沉淀,如判断力等晶体智力、智慧反而越来越强大。人力资本思想最早由亚当·斯密提出,舒尔茨使其概念系统化。不同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展示的资本,是一种能够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生产性资本^[4]。长期来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比物质资本大^[5],并且在追求绿色发展的当下,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已有针对143个国家和地区25年的研究数据表明,无论是传统GDP还是反映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绿色GDP对人力资本的敏感度都要高于物质资本,并且绿色GDP对人力资本的敏感度要更高^[6]。

农业经济时代,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工业经济时代,资本的重要性凸显;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撬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杠杆。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知识、创新驱动转变的背景下,人力资本质量越来越成为推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彰显国家实力的“硬通货”。有研究通过国际数据分析发现,虽然以毛入学率指标衡量的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解释度在下降,但其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贡献仍然在30%~40%^[7]。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此之大,原因在于:首先,教育能够提供高质量人才推动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新常态下,人才的高度、广度日益成为决定经济绿色、开放、共享和可持续的关键和根本。经济的良性发展依赖于产业结构优化、新旧动能转换以及发展方式转变。而升级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需要

以人才为依托,而人才的培养要靠教育。已有研究表明,教育不仅能够推动产业间的转型、产业结构的升级,还可以促进二、三次产业内部的优化^[8]。其次,教育能够通过促进创新发展、提升生产效率来推动经济增长。教育、技能培训可以加速知识外溢、技术扩散和创新发展,加快经济发展进程。一方面,教育通过发掘个体潜能,能够将其配置在合适的职位之上。同时,教育可以提高个体的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增强劳动者知识、技术的获取、应用与创新能力,快速适应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工作机会、职业机会的变化,提升劳动效率。另一方面,教育、科研、服务社会是高校的三大职能。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金字塔,是高质量人才的聚集地,本身就可以通过科研创新,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吕艳、胡娟通过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9]。

(二) 优质均衡教育:缩小不同群体间的贫富差距

共同富裕并非少数人的富裕,所以在“富起来”之后,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实现富裕成果的共享,即如何在实践操作层面解决分配正义的问题。其不是要求“拉平”差距,而是在生产力继续发展的基础上,对弱势群体平等权利的尊重以及基于道义原则的倾斜。

正义是一个古老的观念,早先亚里士多德就曾对正义问题进行过探讨。罗尔斯则是正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其在“原初状态”“无知之幕”的思想情景下提出了正义的两大原则,认为在保证基本自由、机会平等的基础上,追求“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期望利益”的差异分配是正义原则的体现,希望通过正义制度改善“最不利者”的处境^[10]。罗尔斯的分配正义为推进教育均衡提供了方向与基调,体现了“补缺式”的均衡观,落脚点是对现有缺陷的“补全”。而当下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均衡,而且要“优质均衡”。优质均衡是双重结构,不仅是“均衡的”,而且是“优质的”,是一种“新均衡理念”,内在地包含了美好的、高质量的内涵,其不是“抑强”,不是将教育都拉到同一水平线上。其不仅包括经由弱势补偿达成“均等化”目标,也包括“各美其美”的差异化、多样化优质。如果说弱势补偿的教育均衡追求的是一种帕累托最优,是以教育的公共性逻辑作为其支

撑,是以社会为中心和参照点的。那么,“差异化优质”追求的是“差异化发展”,体现了人本主义的逻辑,彰显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包含了面向个体化的、差异化的公平与正义。这种差异化、多样化、个性化均衡发展理念是与党和国家一以贯之的公平观,“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以人民为中心办教育”是相通的。

“弱势补偿”与“差异化发展”为推进教育优质均衡提供了方向与基调,而优质教育均衡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其作用不可小觑。以优质均衡教育为中介,以个体能力提升为途径,以促进个体横向流动与纵向流动、加速代际流动与代内流动为表现,教育具有缩小贫富差距的功效。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优质均衡教育的显性社会收益之一在于实现“收入均等化”,使社会分配趋于平等^[4]。究其原因: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主要在于教育上的差异。城乡、区域的发展差距除了政策、产业结构等的影响外,主要是由人力资本差距、教育差异造成的。以城乡为例,陈斌开、薛进军等的研究均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的40%左右可归因于教育^[11-12]。另一方面,优质均衡教育可以促进代内、代际流动,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效果。共同富裕需要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以“托底”,而贫困形成的原因具有多元性,物质资本、自然禀赋、社会结构和政策制度等都可能影响贫困的形成。其中,个人素质、个体的人力资本是贫困的本质根源^[13],而教育具有提升人力资本的功效,是底层个体代内、代际流动的重要推手。杨娟等的研究发现教育对代内收入差距、代际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分别可达25%、50%左右^[14]。

(三)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国民整体精神富裕程度

经济发展是为个体的自由、自在发展服务的,人的发展本身才是目的。过分追求外在的东西,反会被外物所控制、束缚、奴役,从而导致人的异化。过分追求工具理性,个体会成为社会的机器,进入“现代性的铁笼”,造成个体发展的异常状态。马克思认为正义的终极目标是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其实现前提在于人民群众精神的富足,这也是共同富裕追求的目标之一。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共同富裕,更包含精神上的共同富裕。物质只是手段,人的自由、解放才是目

的。正如西美尔所言,“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无法栖居在桥上的”^[15]。如果说物质生活、社会生活与个体的关系是“物我”“人我”的关系,那么精神生活才是真正的“自我”。而教育除了培养个体能力、形塑良好习惯外,最主要的是可以培育人格、提升思维,是实现精神上富裕的重要途径。

教育之所以能够促进精神上的共同富裕,其原因在于:从社会整体层面来看,首先,教育能够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有赖于文化的高质量发展、社会精神生产的推进。而文化高质量创生、精神生产力提升的关键在人才。这就需要教育培养具备不同思维品质的人才,创造性地对精神生产资料进行加工,以提供人的全面发展所需的“精神食粮”^[16]。其次,教育能够推动文明社会的形成。高度发展的社会不仅要关注到物质成果的共享,更要关注到人们社会-心理层面的平等,对个体尊严、人格的尊重等,即承认正义问题。承认正义问题即群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的正义问题,因社会地位、文化秩序、价值关系上的不平等而引起的主体间人格上的不平等问题^[17]。而不损害个体自尊的教育制度,能使教育中的个体获得自尊、自信、自重,使个体“尊严”得到承认^[18],进而可扩展到对他人的尊重,产生教育品质上的“涟漪效应”,形塑文明社会。

从个体层面来看,一方面,教育能够提升人们的社会生活参与度与获得感。精神生活的富裕有赖于个体心灵的富足。而教育通过系统的知识传递、优质文化的传承,能够增强个体的知识积淀,提升个体的批判能力、认知能力与思维水平,进而能够理解社会文化、价值观并参与公共事务,提升生活品质与成就感。另一方面,教育能够纾解贫困个体的精神贫困,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正如班纳吉与迪弗洛所著的《贫穷的本质》中认为,“穷人之所以摆脱不了贫穷,从而陷入‘贫穷陷阱’的原因之一在于穷人的意识、思维和观念”^[19]。思想观念落后、人生态度消极等是贫困群众存在的问题,而文化教育纾解贫困群众精神贫困的重要手段,是转变个体落后观念,调动其发展积极性、主动性的根本^[20],也是提高其文化修养,完成精神重塑与变革的重要方法。

综上分析,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机理可以通过

图1所描述:一方面,教育以高质量和均衡为抓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推动物质共同富裕。同时,物质共同富裕可形成后续教育升级迭代发展的财力基础反馈于教育,推动教育的发展与最终的教育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教育文化的高

质量发展通过满足个体与社会层面的精神追求,促进国民的精神共同富裕。而进一步地,物质共同富裕与精神共同富裕作为共同富裕的两个纬度,共同助力共同富裕总目标的达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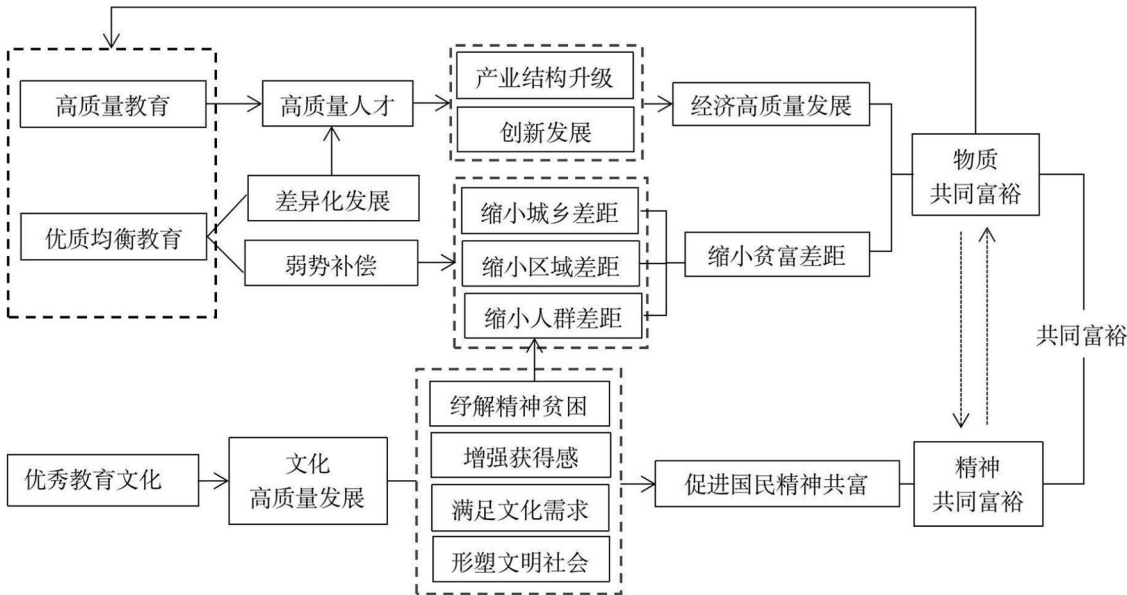


图1 教育促进共同富裕内在关系图

二、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障碍

(一) 人才培养短板是影响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越来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结构与质量。虽然,202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10.9年。但就结构、质量而言,我国的教育体系尚不能很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教育体系自身尚不能满足人们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需要,教育所培养人才的社会适应性、创造性仍显不足。

首先,就教育结构而言,主要表现为纵向层次结构、横向类型结构与整体的形式结构问题。纵向层次结构总体呈现为“葫芦形”结构,即学前教育、高中教育发展不足,高等教育结构失衡。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不应求,尤其是乡村学前教育资源短缺突出,存在幼儿师资和园舍设施等资源分配不均衡、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办园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尚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高质量学前教育的多元化需求。高中教育发展不足,初中:高中:高

校的在校生规模为50:39:44,虽然近两年高中教育在快速发展,但初中毕业生也仅有91.4%的学生能够就读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这就制约了受教育者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的实现。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则呈现一种典型的“纺锤形”结构,博、硕、本、专办学规模的比例为1:6:37:31,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而较为合理的层次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形结构,即博、硕、本、专,比例依次增大,并且保持一定的衔接度。比例上的不协调及相应的本科教育过度与高等职业教育不足直接导致就业问题严峻以及与发展结构不匹配的问题。横向上表现为普职教育间缺乏融通,无论在中等还是高等教育阶段,普职尚难以实现互派师资、学分互认、学籍互转和共同设计课程等,这使得普职教育资源无法实现共享。社会上对职业教育认可度偏低,认为普通教育优于职业教育是主要原因。这使得职业教育对普职融通往往持欢迎态度,但普通高中、高等教育对普职融通缺乏热情,不主动、不愿意向职业教育流动和靠近,普职融通最终成为职业教育的“一厢情愿”。目前形式结构主要表现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齐头并

进、相互补充的局面尚未形成。^[21] 技术迭代速度的加快、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要求人们具备更新知识、终身学习的能力,以满足产业变革、职业转换及开启第二次“人才红利”的需求,而当前学历教育仍是主流,非学历教育、非正式学习虽有扩大倾向,但仍显不足。

其次,从教育质量来看,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尚不能满足人们“上好学”的愿望。一是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发展存在不充分的问题。从教育投入上看,我国学前、小学和中等教育总教育经费投入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0.35%、1.43%、1.72%,而同期 OECD 成员平均分别为 0.83%、1.45%、1.98%,高出我国 0.02 ~ 0.48 个百分点(见表 1)^[22]。从教育过程来看,班级规模依然偏大。我国小学、初中平均班额分别为 38、46 人^[23],而同期 OECD 国家平均班额分别为 21、23 人(见表 2)^[24]。

表 1 中国与 OECD 国家教育经费投入比较				
国家		中国	OECD 成员	差值
总教育经费 占 GDP 比重/%	学段			
	学前教育	0.35	0.83	0.48
	小学教育	1.43	1.45	0.02
	中等教育	1.72	1.98	0.26

(数据来源:王亚男、文静、胡咏梅,2020)

表 2 中国与 OECD 成员国家班级规模比较				
学段	国家	中国	OECD	差值
	平均班额 /人			
小学		38	21	17
初中		46	23	23

(数据来源: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数据以及 OECD,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21)

首先,教育投入、过程上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质量。而直接从教育产出来看,PISA 2018 数据显示,虽然我国四省市学生素养表现卓越,但学生负担与其他国家相比依然偏重。学生的校内学习时长较长,总体学习效率不高,幸福感偏低^[25]。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如合作、批判性思维等发展不足,带来学生发展上的“后劲”不足,对

社会经济变革与国际竞争的适应性不强等问题。

其次,在高中教育阶段,特色化、多样化发展不足。以升学为主导的高中教育对学生的个体差异与选择权关注不足。普教、职教的关系问题尚未完全理顺。虽然,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提出要“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但社会对职业教育是“二流教育”的观念转变,职业教育升学、就业与普通教育同等地位的探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在高等教育阶段,内涵式、适应性发展不足。本科院校培养人才的同质化严重,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对优秀拔尖人才与高水平创新人才的需求。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社会实践能力不强,无法满足产业、市场的需求。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公布的 2020 年《第四季度百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显示,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高级技能人员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分别为 2.9、2.62、2.54^[26]。而根据麦克斯研究院的报告,我国 2020 年应届高职毕业生中有 9.1% 在毕业半年后仍处于未就业状态^[27]。供需的不匹配,导致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结构性失业等现象的发生。

(二) 教育不均衡发展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掣肘作用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注重办学效率,通过基础教育“重点校”制度等将稀缺资源集中于部分学校,导致教育资源、机会分配的不公平。但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与共同富裕中社会整体的共享理念相契合,我们更关注教育公平,注重教育的高质量均衡发展。然而,从当前教育的现实发展样态看,我国尚存在人群、城乡、区域间的教育不公平问题。

一是群体间的教育不公平,主要表现为不同阶层子女的受教育不公平问题。由于教育的高收益性,而优质教育资源、机会的稀缺性与相对有限性,使不同阶层家庭都被裹挟进“教育军备竞赛”之中,利用时间、金钱甚至社会资本投入去寻求子女教育获得的最大化。其中,优势阶层往往占据有利地位。例如,在基础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与本地儿童在优质教育机会享有上存在明显差异,部分随迁子女只能就读于简易民办学校,即使进入公办学校也多属薄弱学校。而在公办学校中,随迁子女因受制度性因素、社会刻板印象的影响,也往往被集

体边缘化^[28]。在高等教育阶段，经理人员、社会管理者等优势社会阶层子女进入重点本科的概率是工人、农民等弱势阶层子女的1.93倍。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学历的父母其子女升入重点本科院校的概率分别是初中及以下学历家庭子女的3.75倍和1.50倍^[29]。

二是城乡的教育不公平，主要表现为城乡间的教育发展差异。目前，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公平已不再是硬件的不公平，而是师资的不公平，师资上的差距严重影响了乡村学生的发展。从数量上看，PISA 2018 数据显示，我国城市、乡村学校的师资短缺指数分别为0.44和0.98。乡村学校的师资短缺现象较城市学校更为严重。从质量上看，2020年，城乡小学教师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分别为99.3%、97.1%。城乡初中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比分别为93.8%、85.4%^[30]。城乡师资等文化性因素成为形塑城乡学生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中心城区学生的认知能力、学业成绩，要依次高于边缘城区、城乡接合部、乡镇、农村的学生，显示出明显的“差序格局”^[31]。这进而影响了农村学生后续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使得他们升入大学的概率变得更低。并且，这种不平等并没有随着高校扩招而缩小。高校扩招以来，城市学生在高等教育机会尤其是精英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上的优势地位依然牢固^[32-33]。

三是区域的教育不公平，主要表现为区域师资、硬件和经费上的差异。其一，师资力量不均衡。师资力量从空间分布上并没有达到均衡状态，受人口、经济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北强南低、东强西弱”的格局^[34]。其二，硬件设施仍存在一定差距。近年来，国家通过薄弱学校改造等措施使区域间教育硬件配置已明显改善。但在某些硬件指标上，区域间仍存在差距。如在生均图书占有量上，西北、华中地区要明显高于西南、华南地区。每百人计算机数上华东地区要远远高于华南、华中地区^[35]。其三，经费投入上的差距。在教育经费支出上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东、中、西部地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分别为17.95%、17.29%、15.25%。而从各教育阶段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看，小学阶段东部地区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分别是中、西部地区的1.82、1.38倍；初中阶段东部地区分别是中、西部地区的1.90、1.71倍；高中阶段东部地区分别是中、

西部地区的2.15、1.80倍（见表3）^[36]。

表3 中国不同区域不同阶段教育经费差异			
区域 区域生均教育 经费支出差异 阶段	区域	东部/中部	东部/西部
	小学阶段	1.82	1.38
	初中阶段	1.90	1.71
	高中阶段	2.15	1.80

（数据来源：黄忠敬，等，2019）

（三）教育对人民精神富裕度的提升不足

精神文明的社会必定不是物质贫乏的社会，但物质充裕的社会未必是精神文明的社会。高质量均衡时代的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资源的均衡、共享，更是精神上的共同富裕。然而，当前我国教育促进精神富裕的体系尚不完备。一方面，教育中的“难题”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另一方面，教育对人们的精神富足程度提升有限。

首先，教育焦虑降低了人们的精神获得感。优质教育发展得不平衡不充分、以高考为主的高利害性选拔考试、以学历为主的社会选人用人机制、重点高等院校带来的高回报率等种种因素催生了家长的教育焦虑，使“虎妈”“鸡娃”“直升机父母”成为教育中的热门现象。唯恐“输在起跑线上”，教育内卷化降低了家庭的育儿幸福感。《中国美好生活大调查（2020-2021）》数据显示，“子女教育”是位列“住房”“收入”之后，老百姓面临的第三大家庭难题，占比达36.19%。“子女教育”影响面广，人群范围横跨26~59岁。越发达城市对“子女教育”越发愁，东部地区、一线城市对子女教育更为焦虑^[37]。子女教育难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幸福感，降低了人们的精神获得感。

其次，人才培养短板弱化了高质量文化的生成。高品质文化产品的充裕是人们精神生活改善的充分条件，这就要求供给侧提供多样化、多层次、多类型的精神产品来满足个体在公共文化领域的需求。而当下，在初等及中等教育阶段，学校、家长对成绩、升学等工具性价值的过度关注，使教育的本体性价值被遮蔽。重知识轻素养、重分数轻能力，使学生的创造性不足，这削弱了多样化文化生产的根基。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国际10岁、15岁学生社会情感能力调查表明好奇心、

同理心、坚持等社会情感能力与学生的创造性高度关联。而在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学校的课堂上,学生的试错行为、冒险精神、坚持的品格等较少出现^[38]。

最后,教育对改善人们精神贫困的作用有限。主要表现为不同群体的相对精神贫困问题与绝对精神贫困问题。对于物质享有上相对富裕人群来说,精神富足水平并没有随着物质发展得到同步提升,由于理想缺失、精神空虚使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资本逻辑在思想上占据上风,导致价值扭曲,陷入精神上的相对贫困。低俗、庸俗、媚俗的“三俗”之风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大行其道,这反映了教育在提升人们精神追求上的不足。对于物质上相对贫困人群来说,由于受教育水平低、观念陈旧等呈现绝对精神贫困问题。精神上乐天安命、思想上贫穷落后、教育上底层循环、娱乐上活动匮乏。张玉平,等人对鄂西农村地区农民生活质量的调研发现,精神上,40%的农民相信宿命,25%的农民安守贫困;思想上,35%的农民缺乏追求、只求温饱,25%的农民安土重迁,20%的农民在生产上因循守旧;教育上,鄂西农村初中辍学率达28%左右,高中入学率仅为5%左右;文化娱乐活动上,65%的人娱乐活动主要为电视节目,仅有2%的人通过报纸杂志获取信息^[39]。这些表明教育在改善相对贫困群体的思想、精神、娱乐和受教育上的不足。

三、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路

(一) 优化人才培养体系,提升物质共同富裕程度

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是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基础。对于教育促进共同富裕而言,其重要任务之一首先在于通过培养高质量人才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就要求教育对人才培养体系给予优化,以教育结构、质量作为切入点与落脚点,以未来为导向,前瞻决策,切实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首先,就教育结构而言,一是要实现层次结构上统筹兼顾。加大对学前教育、高中教育的关注,理顺高等教育的专、本、硕、博发展结构问题。其中,尤其要关注学前教育的发展问题,并在合适的时机推动学前教育普及化。根据赫克曼曲线,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不同的,在学龄前对弱势家庭儿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更大^[40]。并且,从社会回报率来看,

学前教育要大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41]。同时,学前教育覆盖更广泛的受众,人们群众的体验感更强,是真正实现“幼有所育”,提升人们幸福感、获得感的重要路径。二是要推动类型结构多样化融合发展。多管齐下,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推动普职融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考虑在义务教育后引入市场机制,在加强政府监管的前提下,鼓励需求侧的教育投资意愿,以激活政府、市场、社会资源等各方的潜力。一方面,可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有助于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享有,“用脚投票”,淘汰质量不佳的学校。三是要强化对非学历教育的重视。在重视学校教育改善人力资本增量的同时,通过培训、非正式教育等优化人力资本存量。在人口增长放缓的背景下,试图以增量换存量的效力在减弱。通过培训等手段促进存量人力资本社会实践能力的提升,用好人才存量是老龄化社会的大势所趋。同时,可通过推动“学历社会”向“能力社会”的转型、提升职业技术人才待遇等方式,强化“能力本位”,打破“学历神话”,间接助推非学历教育发展的同时,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向技术轨道靠拢,加速生产力发展。

其次,就教育质量而言,除加大教育投入外,还需关注、补齐各级各类教育的短板。一是以未来为导向,推动义务教育内涵发展。通过合作、协作等教学法组织教学以培养学生的智力、社会交往能力、合乎道德的行动能力;通过对包含生态的、跨文化与跨学科等在内的课程知识学习,提升学生的科学、数字和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鉴别信息、应用知识、创造知识的能力以及公民意识、民主参与的积极性^[42]。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的协同交互,评价方式的系统优化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工具优势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齐头并进的高层次、高质量创新型人才。二是以人为本,推动高中阶段教育良序发展。综合经济发展、教育培养能力以及国民意向,慎思普职两类教育的发展问题。尝试综合高中改革,打通转流机制,给予学生试错及再次选择的机会,构建四通八达的教育转换网络,加强“横纵”沟通,形成职教、普教生源可相互流动,职教学生向上升学有通道的高中教育体系。以人人皆可成才为理念,切实形塑一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时代青年。三是以“高教强国”

为目标,推动高等教育优质发展。明确不同类型教育的侧重点,补短板、强优势。研究生教育关注创新思维与能力的培养,本科教育强化核心素养与专业能力,高职教育注重与市场、产业的深度融合。同时应以终身学习理念为指导,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大学优质教育资源开放化,将人力资本培育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周期,充分满足人们完善自身知识体系的追求与需要。

(二) 强化公平正义格局,助力多维共同富裕使命

共同富裕是公平正义的一种社会状态,高质量教育共享作为共同富裕的重要纬度,要求关注不同群体、城乡、区域的教育公平问题,在教育领域贯彻分配正义、承认正义原则,通过优质教育资源、机会共享,缓解人们的教育焦虑,在实现教育领域“共同富裕”的同时,提升人们精神幸福指数。而达成上述目标,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优化。

首先,重视“弱势补偿”,关注城乡、区域教育差异。作为知识代理指标的教育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是促进社会流动的工具,也可能是阶层再生产的“帮凶”。因此,对于弱势教育予以补偿是应有的正义,也是避免因教育过度分化导致城乡、区域差异过大的必需。这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完善制度缩小教育差距。一方面,推进教育治理模式变革。多元主体参与,以“共治求善治”,在发挥政府部门“元治理”角色功能的前提下,向学校、市场、各类社会组织“转移”权力,通过多主体参与重塑教育治理新格局,激活各方活力、群策群力推动落后地区教育发展。另一方面,适时推进教育变革。政策具有时效性,在合适的时机变革不合时宜的政策、出台新政策既是推动社会良序发展的需要,也是提升人们教育获得感与满意度、缓解教育焦虑的要求。二是通过多元路径重塑教育生态。通过数字赋能为乡村、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保驾护航;通过区域协调、结对帮扶为落后地区教育发展提供“领路者”;通过行政性、经济性、社会性政策工具的应用实现空间纬度上的教育公平。

其次,树立“优质均衡”发展理念,追求高层次教育正义。遵循“以人为本”理念,满足人们对优质教育的设想。关注“承认正义”,切实加强对人本身价值的关注。具体而言,其一,从宏观来看,要坚持以人为本、质量为先。不仅要关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教育公平问题以及社会层面

上“有学上”“上好学”的均等化目标,还要逐步推动“以社会为中心”的公平观向多样化、个性化、差异化发展为目的的“以人中心”的发展观转变。其二,就微观而言,要关注承认正义。教育公平并不仅仅是资源的平等分配问题,更包含人的地位、价值的存续问题;不仅包含升学率、巩固率等硬性工具性指标,更应囊括尊重、理解、承认等教育本质的价值性追求;不仅要考虑教育资源的分配,更应增强对人的关注和感知。在此过程中,可通过以“否定性正义”为标的,逐步地、渐进地消除教育系统内、外的非公平、非正义现象来无限逼近教育公平、实现教育正义,满足人们对平衡的、充分的教育的需求,切实提高人们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三) 发挥教育的以文化人功能,加速精神共同富裕实现

物质丰富、精神贫穷的社会是畸形的社会。而精神上的富裕,绝不可能随着物质的充裕而实现。教育的独特魅力在于其既可以加速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又可以形塑精神上的富裕。教育不仅具有创造高质量文化的价值,其本身也是目的。教育培养人的过程不仅是塑造未来公民的过程、也是提升个体精神修养的过程。然而,当下教育要更好地发挥对人们精神富裕的推动作用,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发挥好教育的文化创造功能,从量上增加优质文化供给。教育不仅能够传承、传播文化,还可以对文化进行创造、更新。而教育文化创造功能的发挥取决于其培养的人才质量。有创造性思维、有德行的个体才能创造出高质量、“正能量”的文化产品,异质化的人才库才有可能为人们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食粮”,这就要求教育进行调整,变革不适宜的教育模式。在教育教学中,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在知识传授过程中,注重对学生思维的培养,教会学生“如何学习”。这一方面是信息社会知识陈腐化加速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创新知识所必备的基本技能。“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既要“树人”又要“立德”,使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在习得安身立命本领的同时,形塑多样思维、批判意识、终身学习能力和基本德行素养,从而能够在自己所属的行业深耕厚植,创造出丰富的优质精神产品。通过陶冶人性、培养理性,回归教育本真,回到人本身,培养

出一批优质的精神文化产品创造者,守正创新,为不同层次人群提供可理解、可感知的文化精华。

第二,通过教育以文化人,从质上提升人们的精神富裕度。文明社会,不仅是物质上的“仓廩实、衣食足”,更是精神上的“知礼仪、明荣辱”。从出生到成年,个体在学校的生活占据了其生命的大部分时间。这一阶段也是学生智慧与道德增长的关键时期。把握好这一时期,充分唤醒每个个体的道德观念、精神理念,当此时的一批批学生进入社会之后,则将是彼时的具有自尊、自律、尊重他人、精神充盈的文明公民。这要求教育把握好这一节奏,通过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思政课程、课程思政等形式,将价值观塑造贯穿于各个学科的教学之中,贯穿于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序列之中,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格局。使教育在提升学生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培养其思想道德品质,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理想观、信念观以抵制精神贫困、拜金主义等的侵蚀。同时,考虑到学校是微型的社会,学生是最具可塑性的个体,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比单纯“说教”更具效力。这就要求教师在教育过程中除了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外,还要注重对不同类型学生尊严的维护,尊重学生的不同,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懂得“人人平等”以及对不同群体的共情与尊重,最终形成根植于内心的修养。在制度之光照不到的地方,用理性与精神的自制,构建精神文明的领地。以内在精神的充盈,追求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需要。经由此,教育坐标中一小步的正向前进,经过时间的发酵,可能是人类文明中的一大步。

四、结束语

教育在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能够推动物质共同富裕,而且有益于精神共同富裕。通过高质量教育、优质均衡教育,能够有效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显著缩小贫富差距,从而加速物质共同富裕的实现。此外,经由优秀教育文化,则能够促进国民的精神共富,为精神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然而,在现实发展中,教育在质量、公平以及文化提升上尚存在短板,如优质教育机会不均、教育过度内卷化等,这些都阻碍了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步伐。

展望未来,应更加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地位,优

化教育发展短板,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加速实现。具体而言,未来教育发展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思考、深化与创新:一是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尤其是普职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如何进一步优化教育结构体系,推动普职融合协调发展;如何增加职业教育社会吸引力,在高等教育阶段真正形成职业本科、应用本科和普通本科三足鼎立格局。二是人口变化与教育发展。生育率下降对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这要求教育应有所作为。比如,如何在生源变化的背景下,科学规划各类教育的发展;如何通过减轻家长的作业辅导压力,降低人们的教育焦虑感来增加人民群众的生育意愿。三是数字化时代的教育发展。技术化浪潮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这要求教育更好的与之共舞。比如,如何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更好地融合教育与技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升教育个性化水平;如何更好的让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提升教育公平与效率等,这些都是新的时代背景下,教育促进共同富裕必须面对的新问题,同时也是一种新机遇。

总之,教育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未来的研究应更加注重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在把握结构、公平、质量这类教育基本要素的同时,更加注重教育的创新发展,以适应变革时代的不确定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早日达成!

[参考文献]

- [1] 孙业礼. 共同富裕:六十年来几代领导人的探索 and 追寻 [J]. 党的文献, 2010 (1): 80-87.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3]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16.
- [4] 曲恒昌, 曾晓东. 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26.
- [5] 孙敬水, 董亚娟. 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 [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7 (4): 37-43.
- [6] 黄依梵, 丁小浩, 陈然, 闵维方.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一个实证分析——纪念人力资本

- 理论诞生六十周年[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0, 38(10): 21-33.
- [7] 岳昌君. 改革开放40年高等教育与经济国际比较[J]. 教育与经济, 2018(6): 9-17.
- [8] 吴嘉琦, 闵维方. 教育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J]. 教育研究, 2022, 43(1): 23-34.
- [9] 吕艳, 胡娟. 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分析——基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数据的分析[J]. 中国高教研究, 2010(10): 24-27.
- [10]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修订版)[M]. 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47-65.
- [11] 陈斌开, 张鹏飞, 杨汝岱. 政府教育投入、人力资本投资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 管理世界, 2010(1): 36-43.
- [12] 薛进军, 园田正, 荒山裕行. 中国的教育差距与收入差距——基于深圳市住户调查的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08(1): 19-29.
- [13] 徐晓军, 胡倩. 反贫困的理论研究[N]. 中国经济时报, 2013-02-22(A06).
- [14] 杨娟, 赖德胜, 邱牧远. 如何通过教育缓解收入不平等?[J]. 经济研究, 2015, 50(9): 86-99.
- [15] 西美尔.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 顾仁明,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1.
- [16] 柳菊兴. 激活教育生产力主体活力初探[J]. 培训与研究(湖北教育学院学报), 2001(1): 55-59.
- [17] 冯建军. 后均衡化时代的教育正义: 从关注“分配”到关注“承认”[J]. 教育研究, 2016, 37(4): 41-47.
- [18] 冯建军. 承认正义: 正派社会教育制度的价值基础[J]. 南京社会科学, 2015(11): 132-138.
- [19] 阿比吉特·班纳吉, 埃斯特·迪弗洛. 贫穷的本质: 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M]. 景芳,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 187.
- [20] 王爱桂. 从精神贫困走向精神富裕[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8(5): 44-50.
- [21] 褚宏启, 杨海燕, 曲正伟. 构建高效公平的中国现代教育体系[J]. 人民教育, 2009(19): 6-9.
- [22] 王亚男, 元静, 胡咏梅. “十四五”期间优化教育经费投入结构研究[J]. 教育经济评论, 2020, 5(5): 3-23.
- [23] 教育部. 中国教育概况——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EB/OL]. (2020-08-31)[2021-12-25].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5990/202008/t20200831_483697.html.
- [24] OECD.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21: OECD Indicators[EB/OL]. (2021-09-16)[2021-12-25]. <https://doi.org/10.1787/b35a14e5-en>.
- [25] 教育部. PISA2018 测试结果正式发布[EB/OL]. (2019-12-04)[2021-12-25].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12/t20191204_410707.html.
-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20年第四季度百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EB/OL]. (2021-01-14)[2021-12-25]. http://www.mohrss.gov.cn/xgk2020/fdzdgknr/jy_4208/jyscgqfx/202108/t20210806_420211.html.
- [27] 王伯庆, 马妍, 王丽. 就业蓝皮书: 2021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11.
- [28] 罗云, 钟景迅, 曾荣光.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的分配正义与关系正义之考察[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5, 13(2): 146-167.
- [29] 孙天华, 张济洲. 社会阶层结构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基于山东省的实证研究[J]. 湖北社会科学, 2017(1): 171-177.
- [30] 教育部. 中国教育概况——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EB/OL]. (2021-11-15)[2021-12-26].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5990/202111/t20211115_579974.html.
- [31] 宗晓华, 杨素红, 秦玉友. 追求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新时期城乡义务教育质量差距的影响因素与均衡策略[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8, 39(6): 47-57.
- [32] 李春玲.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J]. 社会学研究, 2010, 25(3): 82-113.
- [33] 孟凡强, 初帅, 李庆海.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是否缓解了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J]. 教育与经济, 2017(4): 9-16.
- [34] 吕赛鹄, 潘玉君. 我国省域义务教育师资配置空间秩序研究[J]. 教学与管理, 2020(21): 18-22.
- [35] 周霖, 邹红军. 县域义务教育学校硬件配置状态及改进对策[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6): 161-166.
- [36] 黄忠敬, 秦一鸣, 吕晓蕊, 等. 我国的基础教育公平吗——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M]//袁振国. 中国教育政策评论.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9: 99.
- [37] 央视网. 独家调查: “子女教育”带来的焦虑感达五年来最高点[EB/OL]. (2021-04-20)[2021-12-26]. <https://news.cctv.com/2021/04/20/ARTIF0LU0Kwvozkh6LADtgmW210420.shtml>.
- [38] 徐瑾劼, 杨雨欣. 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国际比较: 投稿网址: <http://xuebaobangong.jmu.edu.cn/jkb/>

现状、影响及培养路径——基于 OECD 的调查 [J]. 开放教育研究, 2021, 27 (5): 44 – 52.

[39] 张玉平, 骆素莹, 田胜. 在精准扶贫视阈下农村精神贫困问题的调查研究 [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7, 28 (7): 246 – 248.

[40] 詹姆斯·赫克曼, 罗斯高. 世界经验对中国儿童早期发展的启示——罗斯高 (Scott Rozelle) 与詹姆斯·赫克曼 (James Heckman) 的问答录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9, 37 (3): 129 – 133.

[41] 蔡昉. 强化人力资本: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源与径 [J]. 中国人大, 2016 (17): 17 – 18.

[42]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Reimagining a new social our futures contract for together education[EB/OL]. (2021 – 11 – 10) [2021 – 12 – 26].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9381/PDF/379381eng.pdf.multi>.

(责任编辑: 孙永泰)

Education Promotes Common Prosperity :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Breakthrough Direction

WANG Shu – tao ¹, LIU Yan – li ²

- (1.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2.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the goal that the party and state leaders have always sought to achieve. The nature and features of education determine that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compon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but also a key to attaining it. Education can contribute to both material and spiritual prosperity in that high – quality education can lay a solid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common prosperity, balanced and quality education can narrow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fine culture can promote the spiritual wealth for all the people. However,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education still has shortcomings,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s still sever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to the people’s spiritual affluence is still insufficient. Thus, measures shall be taken in terms of optimizing th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pattern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expanding the supply of cultural products.

Key words: high – quality education; balanced education; common prosperity; mechanism